

一句谎言 女编剧变成囚徒

称电视剧已卖出骗钱99万 被判坐牢11年 狱中办刊受到好评

引子

正襟危坐在记者眼前的戴丽娜是个外表白皙柔弱的女子,纤细的鼻梁上架着眼镜,笑容腼腆,说话轻声细语。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书卷气十足的女人,却是个合同诈骗犯!在记者疑惑的目光中,戴丽娜讲述了自己从女作家到女囚犯的经历。

戴丽娜17岁那年到内蒙古插队,25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内蒙古大学中文系。在大学期间,她写的小说《残月寒情》被拍摄成电视剧,在太原电视台播出。大学毕业后,戴丽娜被分配到内蒙古文联,以无花果的笔名发表了大量的小说,其中有畅销一时的作品《黑眼睛》《伴娘》等。一部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篇纪实文学《升平时期的新罪恶》名列当地通俗文学销售之首。

戴丽娜并不甘心过过着门爬格子的生活,她相信自己有能力驾驭文字以外的事情。1996年,戴丽娜辞职来到北京,在撰稿出书的同时,还成立公司经营广告制作和发布以及组织演出。据戴丽娜说,某些著名歌唱演员在内蒙古的演出一般都是她做中介谈下来的。

一句谎言拉来99万元

后期合成没有资金

1998年,戴丽娜投资400万元拍了一部20集电视剧,她兼任策划、编剧及制片人多重角色。因为缺乏经验,她在拍摄中预算严重超支。等偿还了先期的融资后,公司已经捉襟见肘。2000年底,拍摄工作完毕,片子需要后期合成,她已经没有钱了。

为了解决资金问题,戴丽娜四处去跑片子的发行工作。

47岁的戴丽娜曾经头顶很多美丽的光环:小有名气的自由撰稿人、电视剧编剧、独立制片人和广告公司的老板。然而,她的人生也像她写的小说一样跌宕起伏。仅仅因为在拍摄电视剧过程中一句吹牛话,她沦为女犯,被判入狱11年。目前,戴丽娜在北京女子监狱服刑。

她认为,只要片子卖了出去,就有钱进行后期的修改。然而,最初有意购买的主渠道和二渠道发行商都因为电视剧的成品片和剧本存在比较大的差异而放弃了购买。几家发行单位虽然对片子很感兴趣,但提出只有修改剧本后他们才会购买。而且,必须先看完修改完成片后再支付购片款。眼看着时间一天天地过去,而补拍和重新制作后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没有着落,戴丽娜非常着急。为了将电视剧尽快卖出去,戴丽娜决定借钱做后期。

谎称卖出拉来投资

在朋友的介绍下,戴丽娜认识了生意人张某和李某。当他们询问电视剧找到买家了没有,戴丽娜脱口而出:“已经有多家发行单位购买了。”得知戴丽娜还是该片的编剧,二人对她的话深信不疑。经过讨价还价,3人达成合作协议:由张某和李某共同投资电视剧本修改经费99万元,该剧发行后,二人收回投资成本并获得投资款30%的利息。为了让资金尽快到位,戴丽娜在合同中特意加上了某电视台已经同意收购该剧的话,并承诺对方如果投资肯定稳赚不赔。

由于买家还未有着落,戴丽娜迟迟不敢修改剧本。眼看着借款合同就要到期,戴丽娜一心想着只要找到签约买家,马上就可以对电视剧进行修改,电视剧卖出去后只多损失一部分违约金而已。即便做不

成的话,她也会通过做别的事情获利后再还给他们。戴丽娜并没有把合同太当回事。

等投资人开始频繁地催款,戴丽娜仍以资金马上到位为由敷衍对方。到后来,她索性不接电话或者关机。当投资人了解到他们的钱并未用于电视剧的后期修改,他们一气之下到公安机关告发了戴丽娜。

看守所里夜夜失眠

固执认为败在操作

在看守所的每一个夜晚,戴丽娜都睁着眼睛不能入睡。她无论如何都想不通,自己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诈骗犯?戴丽娜向记者解释说,合同是经过双方同意签订的,已经拍摄完的电视剧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自己并没有想骗他们的钱,只不过由于事情进展不顺利,拖延了还款时间。而拖延还款时间按合同规定也有补偿。

很长一段时间里,戴丽娜把自己的遭遇看作“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翻版,觉得自己败在没操作好,没安抚好投资人的因素上。如果当时多些手段稳住他们,不使他们产生被欺骗的错觉,自己就有比较充裕的时间把电视剧卖出去,赚个好价钱。那时不仅皆大欢喜,她自己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赢家。所以,王侯和贼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操作。

认识错误没有上诉

在随后的一次次提讯中,警察的话语让她感到了事情

的严重性。警察说,合同诈骗罪构成要素最关键的两点就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会在融资的时候说尽好话,对风险问题避重就轻,而在投资电视剧这行就更是行业惯例。但法律是严肃而无情的,别人都在做的,未必就是合法的。无论你怎样操作,即使侥幸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但仍然掩盖不了犯罪的事实。

2003年7月,戴丽娜因合同诈骗罪被法院一审判决有期徒刑11年。听到判决时,戴丽娜的脑子一片空白。不过,她并没有提起上诉。一是她觉得自己确实做错了,上诉改判的可能性不大;二是严重的失眠一直困扰着她,而在看守所里没有治疗的机会,不能服用安眠药。2004年3月,戴丽娜来到北京市女子监狱服刑。

与管教干警纸笔交流

别人起床她没反应

今日,戴丽娜已经能够坦然面对从“女作家”到“女囚”的角色转化。而刚入监的时候,巨大的落差和漫长的刑期让她的心沉到了谷底。

2004年11月18日早,监舍大门“咣当”一声打开。服刑人员听到起床的信号后迅速穿衣叠被,只有戴丽娜没有反应。突然,她看到别人张着嘴巴,自己却不知道她们在说什么。由于心理压力巨大,长期睡不着觉,戴丽娜失去了听觉!

“我当时绝望到了极点,哇哇痛哭。”说起当时的情

景,戴丽娜不好意思地笑了。管教干警一边积极地带她去治疗,一边通过书面语言开导她。失去听力后,戴丽娜变得更加敏感猜疑。常常因为一些琐事,她和其他服刑人员闹起别扭。对干警的谈话,她也抱有抵触情绪。

每日“聊天”两大张纸

由于耳聋后不能打亲情电话,又担心年迈的父母担心自己,戴丽娜将心事通过纸条告诉了她在的二分监区的孙秀兰队长。“本来那天不该是我打电话,她二话不说就把我领到了电话室。在拨通电话后,为了不让我妈妈知道实情,妈妈说一句话,孙队长就记下来写给我看。电话足足打了四十分钟,孙队长的手都酸疼了。”由于两人的默契配合,戴丽娜的母亲以为电话信号不好才断断续续的,始终不知道实情。之后,孙队长常常通过纸条的方式和戴丽娜聊天,每天都要写上满满的两大张纸。性格幽默的孙队长用她特有的语言风格鼓励戴丽娜,有时还会用激将法。每次聊天后,戴丽娜都觉得特别轻松。经过数次的开导与谈心,戴丽娜封闭的心门打开了。因治疗及时加上心情渐渐开朗,戴丽娜的左耳已经恢复了正常,但右耳还听不太清楚,监狱也在继续给她进行治疗。

管教干警·印象

她改造热情很高

孙队长说,戴丽娜现在改造热情很高。

由于文笔好,她被分配主办分监区的区刊,同时还给全国监狱系统的各个刊物投稿。“有很多服刑人员给她写信,说看了她的文章增加了改造信心。”孙队长说,戴丽娜还利用业余时间参加自考,现在已经过了四门。目前,她报考的科目有广告与消费心理学和市场调查心理学等内容,是为将来出去工作做准备的。

戴丽娜·心声

监狱洗涤了我的灵魂

入监后,戴丽娜的家人还给她拿来了那部电视剧的剧照,该剧在外地电视台已经播出。

她觉得,这个消息能减轻一点背负诈骗犯的心理负担。对于过去的罪错,戴丽娜也重新进行了总结。她说,过去虽然赚了钱也有些名气,但隐藏在成功背后的缺点却一直未有认识到。“我表面上看来做事细心谨慎,但实际上人不谦虚又轻率,这些缺点跟出事有很直接的关系。”戴丽娜认为,很多人犯罪都因为大脑里有个盲区。和法律盲区有所不同的是,它游走于是非之间,徘徊在对与错的边缘,人们常常于无所知觉中陷入犯罪泥潭,是监狱让她洗涤了灵魂,但毕竟这不是光荣的去处。

戴丽娜说,服刑期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失去自由和亲情的分离。她尤其愧对即将大学毕业的女儿。来监狱探视的时候,女儿从来没有在她面前流过一滴眼泪,而这种坚强是她所不愿意看到的。她说,这种愧疚将一直啃噬自己的灵魂,直至重获自由的那天。

据《北京晨报》

马兰余秋雨的“红木姻缘”

在婚姻中,“老少配”自古有之,但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每一次名人的“老少配”婚事,总会引起社会或媒体的议论或关注。“老少配”之所以引起众说纷纭,是因为它与一般的婚姻关系不同,夫妻间的年龄相差较大,这容易让人产生“代沟”的联想。可事实上,幸福的婚姻不是以年龄为准绳的。著名演员马兰就将她与著名作家余秋雨的婚姻形容为“红木家具,越老越有价。”

毕业演出时 她躲在音几里痛哭

很多人认识黄梅戏演员马兰是从1984年的央视春节晚会开始的,那时她剪着短发,穿着格子裙,整个人就像是一朵清香的兰花。此后她的舞台形象更深入人心,从《龙女》《红楼梦》《西厢记》,一直到后来的电视剧《严凤英》等,让观众记住了黄梅戏,也记住了马兰。

但在事业如日中天时,马兰选择了淡出,如今人们更关注的是她怎样当好余秋雨的太太。

马兰出生在安徽太湖县,当时正好上演一部电影《马兰花开》,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像电影中的小兰那样勤劳朴实,就为女儿取名为“马兰”。马兰的母亲是当地的黄梅戏剧团的演员,父亲是一名大学生,从事黄梅戏舞美设计

工作。受家庭因素的影响,13岁的马兰穿着碎布做的上衣,背着自己的行李走进了安徽省艺术学校的大门。

刚上艺术学校时,马兰是个十足的“胖妞”。为了减肥,整整三个月,马兰只吃面条,没有吃一粒米。为了减肥,她还常常在半夜三更的时候偷偷一个人赶到练功房去练功。

毕业演出那一天,正好是马兰18岁生日;她的任务只是给人家搬凳子、搬布景,连作品都没有。马兰一个人躲到小吞几里顿足痛哭,她发誓一定要减肥,将来要比18岁时更好。

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安徽省艺术学校毕业后,马兰被分配到了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第二年,马兰就迎来了她艺术上的第一个春天。在香港,马兰主演了黄梅戏经典剧目《女驸马》,几乎是一夜成名,她迅速成为黄梅戏的头牌女演员。1989年,马兰更是凭借着电视剧《严凤英》,在艺术上取得极大成功,一跃成为中国最著名的黄梅戏演员。

他的一本著作 使两人结缘

而那时候的余秋雨虽然已经是上海戏剧学院的院长,但在民间的名气却远逊于马兰。

有一次,艺术界的一位老专家送给马兰一本余秋雨的理论著作《艺术创造工程》,并叮嘱她:“艺术工作者一定



生活中的马兰

要读读这本书。”就是这本书让24岁的马兰认识了40岁的余秋雨。

读了这本书后,马兰就被作者的睿智和学识深深吸引和折服了。

马兰后来回忆:“我当时想,这本书的作者肯定是一位阅历丰富、满头白发,甚至可能带着点学究气的老先生。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倒是很想认识这位余秋雨老先生。”

不久,马兰去上海演出《遥指杏花村》,当时她冒昧地打电话邀请余秋雨去看,但是她自己却没有戏票,倒是余秋雨说:“我有啊,你要的话,我可以给你几张。”《遥指杏花村》的演出很

成功,谢幕的时候,马兰四处张望,盼着余秋雨出现。这时,一个中年人健步登台高声地招呼她:“嘿,马兰,我就是余秋雨!”

原来余秋雨对马兰也仰慕已久!就这样,两人第一次会面就播下了爱情的种子。

一天,余秋雨突然对马兰说:“我觉得,你做我的老婆挺好的。”

马兰马上回了一句:“我觉得呀,你做我的老公也不错。”这就算是求婚,很快余秋雨和马兰结婚了。余秋雨比马兰整整大了16岁,“老夫少妻”式的结合曾经引来过许多人的流言飞语,但他们却觉得两个人有差距。

一回到家 她就下厨做饭

作为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院长、安徽省文化系统高级职称评委负责人,马兰不能如平常女人一样每天回家守在丈夫身边,但她一回到家中,总是不辞辛劳地去菜市场买丈夫喜欢吃的螃蟹、咸鸡什么的,亲自下厨做饭吃,以补偿自己不能居家的日子。

最初家里没有请人打扫,马兰演出来总觉得家里到处都是灰尘,就开始自己动手擦。可余秋雨对她说:“所谓尘世就是充满灰尘的世界,要学会承受,别擦。”

马兰却从来没有抱怨过,她说自己回来辛苦一次至少可以让丈夫享受一个星期。

更为难得的是,马兰还到婆婆家包揽全部家务。这时,余秋雨总是拦她,马兰就急了:“我好不容易找到你这么个丈夫,你还不给我一个机会和环境尽尽妻子的义务!”

当然,夫妻之间总有磕磕碰碰的时候,但是两人吵架之后,一般是马兰做出让步,先求和,“因为家里是个不讲理的地方,对于一些小事情不能太较真。”

我们的婚姻 如同“红木家具”

从知名黄梅戏演员,到著名作家太太,马兰婚后的社会角色发生了突变,这丝毫不改变余秋雨对她的评价:“马兰肯定

不仅仅是有外貌。在古典的概念中,读书的权利全部交给男子这一方,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了。她并不仅仅只是看重我的才,我也不仅仅看重她的貌。”

马兰不仅有着美丽脱俗的外表,更有着深邃精辟的内涵。她对表演之外的现代艺术,如美术、音乐等,都有很高的兴趣和比较广泛的理解。秋雨介绍说:“马兰对国际政治、国际军事特别感兴趣。这也是我们谈话的一个话题。”有一段时间他们去中东地区,共同的兴趣使得旅途始终谈兴甚佳。余秋雨十分惊讶妻子居然对萨特的存在主义那么熟悉!他认为:“就感性文化而言,在对当代欧美艺术文化的了解程度上,她肯定超过我。”

“我们感情很深,感觉很好,思想同步。”余秋雨曾经这样评论他和马兰的关系,“我们属于一见如故,从始至终关系都是非常的和谐和密切。我们既是夫妻,又是艺术伙伴,我们都非常尊重对方的父母。共同生活了十几年,我们的思维方式、人生观念和艺术观念已经成为了完全一致的人,我的文化活动和我的专业有关,也跟我太太的专业有关。”

马兰说:“我跟余秋雨之间,有非常好的沟通,文化不同没有关系,希望大家都能够沟通。”她还戏称道:“我们的婚姻就如同‘红木家具’,越老越有价。”

据《新闻午报》